

朱彝尊酬唱《乐府补题》咏物词风格成因

张世斌

(天津美术学院 社会科学部, 天津 300141)

[作者简介] 张世斌(1966), 女, 天津人, 天津美术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明清词曲研究。

[摘要] 朱彝尊论诗词一贯强调真情和寄托。他酬唱情真意幽的《乐府补题》时, 仅止于咏物, 情意全无, 明显违背自己的主张。所以如此, 乃因朱彝尊后期大改初志, 转投清廷, 故言语多讳。

[关键词] 朱彝尊; 乐府补题; 大改初志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81X(2006)03-0316-06

《乐府补题》是成书于元朝初年的一部咏物词集, 作者皆宋末元初遗民词人。存词共五调 37 首, 即《天香·龙涎香》8 首、《水龙吟·白莲》10 首、《摸鱼儿·莼》5 首、《齐天乐·蝉》10 首和《桂枝香·蟹》4 首。此书元、明两代未见流传, 至康熙十七年朱彝尊在常熟吴氏处始见抄本。朱彝尊携之入京, 然后由蒋景祁镂版刊刻, 始得流传^[1](卷36)。自《乐府补题》重现于世起, 其所蕴含的深沉寄托已引起时人注意, 尤其清初与元初国家同样沦为异族统治的相同背景, 自然极易引发当时士人幽思故国、感慨万千之情, 所以“自康熙十八年以后的十数年中, 拟《补题》而群相酬唱的有近百家之多”^[2](第229页)。在这场词坛有史以来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酬唱活动中, 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起着引领潮头的作用。他不但遍和《补题》五调, 有些词调还一和再和。然而, 细读这些咏物词, 发现朱氏作品与《补题》存在着明显的偏离, 甚至迥异其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奇怪的现象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朱彝尊身世、经历的剖析, 找出造成这一偏离的根本原因。

《乐府补题》深含比兴寄托。这一特点, 在其复出之初, 已为时人所通识。朱彝尊、陈维崧为《乐府补题》重新刊刻所撰写的序言, 便是明证。

按集中作者……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 虽有山林友朋之娱, 而身世之感, 别有凄然言外者, 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

——朱彝尊《乐府补题序》

嗟乎! 此皆赵宋遗民作也。粤自云迷五国, 桥谿啼鹧; 潮歌三江, 营荒夹马; 寿皇大去, 已无南内之笙箫; 贾相难归, 不见西湖之灯火。三声石鼓, 汪水云之关塞含愁; 一卷金陀, 王昭仪之琵琶写怨。皋亭雨黑, 旗摇犀弩之城; 葛岭烟青, 剑满锦衣之巷。则有临平故宅, 天水王孙, 无聊而别署漫郎, 有谓而竟成逋客。飘零孰恤? 自放于酒旗歌扇之间; 惆怅畴依? 相逢于僧寺

倡楼之际。盘中烛炮,间有狂言;帐底香焦,时而谰语。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

——陈维崧《乐府补题序》(卷7)

然而,《乐府补题》的兴寄风格在朱彝尊的和作中难觅踪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竹垞《茶烟阁体物集》二卷,纵极工致,终无关《风》《雅》。”但是,咏物词未必无比兴则不出佳作。苏轼的多数咏物词并无寄托,却能感人至深。如被张炎称为“压倒古今”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未用任何托比隐喻,但由于作者全情投注,物我合一,读者便在杨花的飘舞中深切体会到作者感情的起伏激荡。

那么,朱彝尊咏物词流于平庸的根本原因何在呢?现将王沂孙与朱彝尊《天香·龙涎香》词加以比较:

孤峤蟠烟,层涛洗月,骊宫夜采铅水。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云天气。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谩惜余薰,空篝素被。

——王沂孙《天香·龙涎香》

泓下吟残,波中焰后,珠宫不锁痴睡。沫卷盘涡,星垂尺木,采入蜃船鲛布。南蕃新谱,和六一、丹泥分制。裹向罗囊未许,携归金先试。炎天最饶凉思。井华浇、帛铺澄水。百沸琼膏噓作、半窗云气。麝火温黁欲陷,又折入、犀帷袅难起。螺甲重挑,茶烟较细。

——朱彝尊《天香·龙涎香》

王沂孙《天香·龙涎香》上阕引《庄子·列御寇》和陈敬《香谱》,写龙涎香的采集、焙制及焚蒸经过,至“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与下阕“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相呼应,显然并非纯写龙涎香;下阕“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令人顿生感慨今昔、悲怆凄凉之情,结句“谩惜余薰,空篝素被”,更增加了惆怅迷惘之情。常州词派论词重比兴寄托,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将王沂孙《乐府补题》诸词一一比附。即使不言兴寄,我们仍能从王词中感受到作者激荡难平、吞吐幽咽的感慨之情。然而,在朱词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有精细入微的状物、典雅妥帖的用典,除单纯的赋物之外,很难感受到作者主观情意的投入。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借对采香、制香及烧香全过程的细腻发微的描画,来掩饰情感的匮乏。刘熙载《词概》云:“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朱彝尊的咏物词却在回避咏怀,回避自我。不止《天香·龙涎香》,朱彝尊和《补题》诸作乃至后期绝大多数咏物词,几乎都存在这一致命缺陷,这正是朱彝尊咏物词与《乐府补题》诸作的最大区别。明代戏剧家徐渭说:“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所以,我以为,朱彝尊咏物词难获认可的根本原因,乃是“真情”的严重缺失。读者从他的咏物词中,根本感受不到作者内心的情怀与灵魂的激荡。正因这一致命伤,朱氏咏物词虽有着摹物细腻传神、笔法精工雅趣、用典妥贴自然等诸多优点,仍不免被讥“是方物略耳,是群芳谱耳”。然而,朱彝尊一向注重词的传情功能,在为陈维崧《红盐词》写的序言中,强调应“情见乎词”^[1](卷40)。在作于康熙初年的《解佩令·自题词集》中写道:“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都说明朱彝尊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爱恨情仇倾注于词中,而至情至性的《静志居琴趣》更是最有力的明证,“锡鬯情深”^[2](第187页)也正指此说。那么,为什么朱彝尊的和《补题》咏物词,却反而“不足于情”了呢?

当代学者对于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也作了较深入的探究。张宏生在《清代词学的构建》中提出,造成偏离的主要原因是朱彝尊“希望跳出一种思维定势,反映出他为了追求独创性而作的主观努力”^[3](第55页)。但我以为此说法颇值商榷。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言:“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这里“极其工”是对词的写作技巧而言;“极其变”,则重点针对词的思想内容而言。宋季由于异族入侵、江山沦丧,词中寄托身世之慨、家国之痛的内容大幅增加,朱彝尊对此显然是持赞许态度的。被朱彝尊认为“最为杰出”的姜夔,咏物词也正以“咏物而不滞于物”著称。况且,朱彝尊在《乐府补题序》中,涉及《补题》内容主旨的惟一句就是:“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显然,令朱彝尊欣赏《乐

也不应脱离作者所推崇的这一重要主旨。

二

朱彝尊的曾祖朱国祚,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恪”。嗣父朱茂暉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朱彝尊生于崇祯二年(1629),甲申明亡时,虚龄16岁。次年嘉兴城破,他的从祖朱大定即“首倡起兵,据守嘉兴”,不数日,兵败被俘,“执送杭州,不屈死”^[1](卷36)。朱彝尊随乡邑义军参加过抗清活动,兵败后,遂避入归安县岳家入赘为婿。

朱彝尊25岁起客游南北,客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络同志、抗清复明。他在《王礼部诗序》中写道:“(予)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见于当世。……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滇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矢志之士。”^[1](卷37)这些幽忧矢志之士即指魏耕、钱缵曾、朱士稚、陈三岛、祁班孙等。朱彝尊在顺治十五年前后还直接参与了这些人组织的秘密反清活动,联络海上抗清之师。“主山阴祁氏兄弟,结客共图恢复。”^[7](卷7)朱氏的这段生活经历,在其《题祁六班孙东书草堂》《祁六紫芝轩留别》《同魏周二处士集钟渊映宅迟俞汝言不至》《梅市逢魏璧》等诗中,或隐或显地有所体现。康熙元年事败后,“二人(魏耕、钱缵曾)坐法惨死;祁子(班孙)亦株系,戍极边以去”^[1](卷72),此事即清初著名的“通海案”。在《杂诗》中朱彝尊对失败的原因作了痛切的总结:“于心徒欲速,为计苦不周。”在《西陵感旧》《梦中送祁六出关》等诗中,更直接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切悼念之情。后朱彝尊远走永嘉,时间正好在此案发生后不久,避祸目的显而易见。

朱彝尊长期与明末遗民顾炎武、屈大均、阎尔梅、纪映钟、傅山、杜濬、陈恭尹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顾炎武和屈大均更将其视若知己。顾炎武长朱彝尊16岁,却对朱彝尊极为器重,曾说:“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8](第134页)在《朱处士彝尊过余于太原东郊,赠之》一诗中,对其积极参与抗清活动赞颂不已:“揽辔长城下,回车晋水滨。……吞声同太息,吮笔一酸辛。……与尔皆椎结,于今且钓纶。……自来贤达士,往往在风尘。”朱彝尊在顺治十三年客游广东时,与屈大均结识,两人都直接参与了顺治末年魏耕等的抗清活动,更有一份战友情谊。朱彝尊对屈大均的志向情怀一直推崇备至,在《九歌草堂诗集序》中赞扬:“世徒叹其文字之功,而不知其志之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子,颂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

在长期的颠沛中,朱彝尊创作了大量不满清廷、思念故国的诗词。朱彝尊极其强调“诗言志”,曾在多篇序文中反复论及:“言志之谓诗”^[1](卷36),“诗以言志,诵其诗可以知其志矣”^[1](卷36),这一时期的诗作都较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朱彝尊这一时期的词论对后世影响更大,他提出:“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1](卷10)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录取博学鸿词科之前,一直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正所谓“不得志于时者”。从某种角度说,词更能准确传达作者“诗所难言”的复杂感情。总之,出仕之前的朱彝尊,立言行事都带有更多遗民色彩,正如刘师培《书〈曝书亭集〉后》所云:

夫朱氏以故相之裔,值板荡之交。甲申以还,蛰居雒诵。高栗里之节,卜梅市之居。东发、深宁,差可比迹。观于《马草》之什,伤满政之苛餐;《北邙》之篇,吊皇陵而下泣。亡国之哀,形于言表;此一时也。及其浪游岭峤,回车云朔,亭林引为知音,翁山高其抗节。虽簪笔佣书,争食鸡鹜,然表明妃于青塚,吊李陵于虏台,感慨身世,迹与心违;此一时也。

康熙十七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征举名士。户部侍郎严沆、吏科给事中李宗孔等,荐举朱彝尊应试博学鸿词科。同年夏,朱彝尊自江宁应召入都。次年参加会试,被录取后,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纂修《明史》。

以朱彝尊前半生的经历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极其重大的人生逆转。《清史稿》载,同时被推荐的人

“称疾笃,昇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顾炎武在“大臣争荐之”的情况下,“以死自誓”乃免,从此绝迹不往京师。友人沈岸登写词《南浦送竹垞被征入都时道出白下》:“唤起阶前猿鹤问,还肯劝君留否?”引孔稚珪《北山移文》的典故进行讽劝。屈大均写诗《赋寄富平李子德》:“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已日成”,毫不客气地指责朱彝尊与李因笃的变节行为。朱彝尊仕清后,顾炎武即与其断绝了交往。所有这些都未阻止朱彝尊入京的脚步,却给他内心以深深的刺激。朱彝尊有一首《占意投高舍人上奇》,表达对被荐入京的推却之意:“爱居北海处,亦复辞烟渚。……寄言鸾凤侣,释此归飞禽。”

朱彝尊曾撰《宋太宗书库碑跋》云: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致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广其卷帙,厚其廩禄贍给,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则帝之留心翰墨,特出于权谋秘计,而非性之所好也。

可见,朱彝尊对于清廷开设“博学鸿科”之“权谋秘计”体察详深。然而,为安享廩禄贍给,其最终不惜付出“役心”之代价。人是复杂的,廩禄贍给难以抗拒,内心却未必能安然享受。在传统士人心中,名节远较生命重要。在朱彝尊之前,如钱谦益曾主动开城降清,后痛悔不已,秘密支持抗清以图自赎,所创作的大量诗作,更充分表现了其复杂痛楚的难言心绪。另一位变节诗人吴伟业,在成为“贰臣”的近20年时间里,几乎把全部情思都集中于自悔自忏的哀叹中,反复为自己辩解,“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趋”。朱彝尊未取得前朝功名,与钱谦益、吴伟业辈不同,即使出仕清廷,亦不用背负“贰臣”罪名;但朱彝尊又确实有他的特殊性,前半生的经历遭际,使他身上具有了更多遗民诗人的特征,所以在知天命之年大改初衷,返身仕清,其实质已大有变节的成分,而何况明清不只是朝代之更替,更是被视为大防的“夏夷”之变。

朱彝尊在《膝笑集》序言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

竹垞主人少无宦情,耕长水之南,年五十矣。天子下诏,征文学之士,备顾问著作之选。有荐于朝,召试体仁阁下。天子擢居一等,得除翰林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进士及第与庶吉士者,不居是职,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异数矣。……其曰《膝笑集》者,取诸孔稚珪《北山移文》之语也。噫!主人以诗文流传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禁近,赋命诚非薄矣,卒齟齬于时,人方齿冷!宜其焚弃笔研,勿复为愿,仍为之下已,则笑之者亦不已也。项平父有言:“世之人无贵贱,皆畏人笑,独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独不畏,且甚欲之。”然则主人所为,毋乃近于滑稽也乎?

《膝笑集》于康熙二十五年结集刻印,主要收录朱氏入仕之后的作品。这篇序文将朱氏入仕后的矛盾复杂心态展示得极为充分。一方面,沾沾于“以布衣通籍”,另一方面,竟以滑稽者自喻,其内心对自己晚节不保的愧疚痛楚可以想见。序中写明,文集题名取自孔稚珪《北山移文》“于是南岳献嘲,北垓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充分表露了朱彝尊当时进退失据的尴尬心态。可见,朱彝尊实际与钱、吴一样,难以摆脱“两截人”的灰色心理。康熙二十八年黄宗羲80寿诞时,朱彝尊所作的《黄征君寿序》更印证了这一点:“予之出,有愧于先生。顾性好聚书,传钞不辍,则与先生有瓷芥之合。明年归矣,将访先生之居借书焉。百家(黄宗羲之子)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1](卷11)

三

我以为,只有循着朱彝尊仕清心态这一脉络,其咏物词与《乐府补题》的明显反差才有可能觅到正确的答案。朱彝尊在常熟吴氏处见到《乐府补题》抄本,以其大半生之经历志向,读到“宋末隐君子”“骚人《橘颂》之遗音”,遂“爱而亟录之,携至京师”,自在情理之中。然自身已成为“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再在词作中“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汗伪籍而自托乃心”,则沦为顾炎武所指斥的“弥巧文而不惭”的“文辞欺人”^[1](第848页)者了。朱彝尊应征博学鸿词科时,时事较之钱、吴当年已发生了很大的

的灰色心理也采取了与钱、吴颇为不同的抒发方式,即淡化家国之恨、身世之感,而以歌咏太平的形式,来回避自身“后先异轨,出处殊途”的尴尬与愧疚。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上面所引,是朱彝尊仕清后为丁炜《紫云词》所依序言中的一段。姑且不论朱彝尊此时所阐述的观点与前期词论之严重背离,单就其创作实践而言,朱彝尊这一时期的词作,确是做到了“宴嬉逸乐”“歌咏太平”,但其诗歌创作却难见“兵戈俶扰、流离琐尾”。朱氏最推尊的诗人是杜甫,将其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准的:“惟杜子美之诗,其出之也有本,无一不关乎纲常伦纪之日,而写时状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则善学诗者,舍子美其谁师也欤?”^[1](卷3)但是,朱彝尊仕清后的诗歌,却多谢恩、赠行、题画以及联句等空洞无聊之作,难见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故汤大奎在《炙砚琐谈》中说:“杜陵诗格沉雄响,一著朝衫底事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滕笑集》末附署“老柳”(冯登府)跋语亦云:“此卷类酬应之作,……心平气和,无复江潭憔悴时。”朱氏自己亦直言其诗歌创作的变化:“一变而为骚诵,再变而为关塞之音,三变而为吴侬相杂,四变而为应制之体,五变而成放歌,六变而作渔师田父之语。”^[1](卷36)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言:“今则兵戈尽偃,……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之可偏废欤?”可见,在朱彝尊看来,当时“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之乐”的文学形式显然不止于词,所谓“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不过是对“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强化而已。

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论及朱彝尊咏物词与《乐府补题》差异时云:“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2](第232页)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但认为朱彝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2](第233页),未免将朱彝尊这一经历复杂、才名兼具的封建时代士人的思想感情简单化了:似乎朱彝尊既已出仕清廷,则必竭尽御用文人之能事。忽视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幽隐复杂的心理因素。朱彝尊咏物词对《补题》的有意偏离,可能有一定“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乃至规避“文网”^[1](卷10)的目的,然纵观其一生,细读其入仕前后诗词作品,我以为,咏物词对《补题》偏离的根本原因,乃是朱彝尊“两截人”灰色心理的复杂折射。魏世效《与朱竹垞翰林书》:“今初夏客粤东,友人与朱先生善者问效曰:‘先生处隐约数十年,一旦就征,当清华之选,为人主所倚毗,往者慷慨卓犖之志,今其何如?’”朱彝尊难以面对好友故旧的讥讽责问,又羞于“弥巧文而不惭”,只有回避的策略了。所以朱彝尊咏物词对《乐府补题》的偏离,是一种有意识的回避。在清初与元初惊人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在“往者慷慨卓犖之志”与当前“名汗伪籍”的强烈反差中,朱彝尊只有将心灵彻底包裹起来,逃避现实,也逃避自己。艺术上似乎达到了“醇雅清空”的极至,而至真至性之情却丧失殆尽。

朱彝尊创作历来有逞才的特点,赵执信《谈龙录》所谓“朱贪多”,即指此而言。仔细研读朱彝尊诗词作品就会发现,征典炫才在朱彝尊仕清后的诗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词方面,朱彝尊康熙十八年后所作多咏物词,这些咏物词绝大多数胪列故实,铺张鄙谚,竭尽腹笥之富。“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醇雅,今则又益一派曰短钉。宋人咏物,高者摹神,次者赋形,而题中有寄托,题外有感慨,虽词实无愧于六义焉。至国朝小长芦出,始创为征典之作……”^[3](第3143页)如《雪狮儿·咏猫》多达三阙,无不堆砌短钉,逞才斗奇,成为“游词”的始作俑者。在诗歌方面,正如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所总结的,“通籍后”,歌行亦“往往贪多务博,散漫驰骤,无归宿处,有类游骑矣”。以“联句”为例,朱彝尊在各个时期都有“联句”之作,而数量却以仕清期间为最多,内容也最空泛。如《采玉山药联句》《苦热联句》《竹炉联句》《枣花联句》,乃至《联句十首》,将藤枕、风灯、油纸扇、凉篷、竹帘等一一题咏,连章叠什,无不博征典故而又无聊之极。显然,征典炫才实际上成为朱彝尊掩饰情感空枵的最好手段。朱彝尊这一时期的赠行诗、题画诗也都空洞无物,纯为酬应。将朱彝尊晚年手自删定的《曝书亭集》与《滕笑集》相应部分对勘,即

《送人宰顺德》;尤其《曝书亭集》竟将《膝笑集》卷四《题王翠夏山图》二首及《又题高学士江村图》之第二首合并,改题为《王翠画》三首。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就此论云:“或谓得一佳语,便可敷衍成篇。今观《膝笑集》中诗,有改题目而存者,既无当于实事,且何足以见性情乎?”“何足以见性情”正点出了朱彝尊晚年诗词的症弊所在。

纵观朱彝尊一生创作历程,可发现诸多矛盾之处:如晚年所写《紫云词序》,与早年《红盐词》序、《静惕堂词序》中词学观点的大相径庭;如朱彝尊最为推崇姜夔,然而其咏物词“粘滞于物”,与姜夔咏物词“空灵抒情”风格差异极大;再如和《乐府补题》咏物词与《补题》原作之迥异。要想真正解开这些疑团,除了结合作家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外,还必须深入了解朱彝尊复杂的经历际遇以及由此形成的幽隐曲折的心理,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参 考 文 献]

- [1] 朱彝尊. 曝书亭集[M]. 四部丛刊本.
- [2]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3] 陈继崧. 陈迦陵文集[M]. 四部丛刊本.
- [4] 谭 献. 篋中词[C]. 尤振中,尤以丁. 清词纪事会评. 合肥:黄山书社,1995.
- [5] 张宏生. 清代词学的构建[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6] 温睿临. 南疆逸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 [8]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唐圭璋. 词话丛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 顾炎武. 日知录[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何坤翁)

Formation of the Style of Intoned Narration *Ci* of ZU Yizun Singing and Versifying *Yuefubuti*

ZHANG Shibin

(Teach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141, China)

Biography: ZHANG Shibin (1966),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Teach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majoring in *Ci*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ZU Yizun always emphasized real sentiment and profound meaning persistently in poesy. But nothing sentiment in his poesy in breached of himself proposition in evidence while he singed and versified *Yuefubuti* of real sentiment and profound meaning. The whole truth was ZU Yizun apostatized and acceded to officeholder of Qing Court in his late years, accordingly he scruple to poetical works.

Key words: ZU Yizun; *Yuefubuti*; apostatized